



摩登主义

1927-1937

上海文化与文学研究

张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摩登主义

1927-1937

上海文化与文学研究

张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摩登主义: 1927~1937 上海文化与文学研究/张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161-5912-5

I. ①摩…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上海市—1927~
1937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9706 号

出版人 赵剑波
选题策划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 雁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279 千字
定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兴盛于20世纪30代上海的摩登文学以至摩登文化现象，是个不大容易出新的研究课题。因为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研究，尤其是随着严家炎先生、吴福辉先生和李今女士相关论著的先后出版，学界对于海派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以至于紧随其后的研究者除了重复进行不断加码的“现代”追认之外，似乎只能无所事事了。而从另一方面看，随着上海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的重获繁荣并且重新与国际时尚接轨，对旧上海之老摩登的再发现和新发挥，又成了一个相当时髦的公共话题，尤其是以李欧梵先生重构上海摩登的著作之热销和王安忆重写上海摩登的小说之得奖为契机，自外而内从南到北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上海摩登怀旧热，而新的简单化倾向亦于焉浮现：陶醉在怀旧热中的人们，似乎只满足于把旧上海老摩登的形形色色视为无可置疑的现代而照单全收，却全然罔顾在半殖民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等差格局下，上海滩上究竟交织着怎样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倘考虑及此，则诸如把“上海租界里的中国作家热烈拥抱西方文化”的摩登行为不加分析地礼赞为“中国世界主义的表现”之类论调，实在是太嫌简单且有误导天真之嫌。这种情况表明，关于摩登的海派文学和文化研究正面临着一个临界点——研究者如果仍然满足于“现代”的追认和“摩登”的礼赞，则除了一再重复的论调和一唱三叹的凭吊外，确乎是别无剩义了；但其实人们看见的也许只是海上的冰山一角，而倘能拓展视野、深入实际，在广泛的联系中重新审视“上海摩登”现象、重新反思其间的问题，则未必就没有推进研究和深化认识的余地。

说实话，对不断加码的“现代”追认和没完没了的“摩登”礼赞，我久已有点不大耐烦，对一些流行的权威观点，我也多少有点不以为然的异见，这些我在给李今女士的《海派小说论》的台湾版所写的代序中，曾经有所表达。不过，那在我不过是借题发挥、略发感想而已，仔细深入

的探讨，我既无能力也无余暇去做，而正有待于更年青一代的学子来继续。

张勇正可谓恰当的人选，一则他以前的硕士学位论文做的就是关于新感觉派小说的研究，在这个课题上有一定的积累和基础，二则他好学深思、肯下功夫，自2004年秋到清华读书以来，他一直继续关注和思考着这方面的问题，阅读了大量与海派有关的旧书报刊，不断有文献上的新发现。比如，穆时英的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三一》的一个散佚部分《上海的季节梦》，就被他发现并写出了扎实的考证分析文章；同时他也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比如对正在崛起的都市文化研究和消费文化理论，他就颇为关心而又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以对常常被人混而论之的“摩登”和“现代”之同异有足够的敏感……这一切都使我相信他有可能对这个似乎接近学术极限的研究课题作出新推进，所以当他稍后和我讨论其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我便向他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应该说，张勇来清华时已非少不更事的愣头青，而显然经过了一些生活上的磨炼，所以为人沉静踏实而不随俗敷衍，为学肯下苦功而自有主见。他对这个课题也没有贸然接受，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才确认了的。这倒让我觉得对他完全可以放心，因此选题确定之后，我就完全放手让他独立去做了。

随后的两年，张勇便全力以赴从事这个课题的钻研与写作，在文献的发掘和问题的辨析上不断有可喜的进展。看到接连送来的文献资料和陆续写出的论文初稿，我的眼睛常常为之一亮。到2007年夏秋之际，他又对论文初稿进行了集中打磨和结构调整，是年冬遂提交预答辩和答辩。参加这两次答辩的专家有钱理群、吴福辉、方锡德、王中忱和格非诸先生，大家都觉得张勇的这篇论文是海派文化和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突破。评委老师们的赞赏并非偶然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张勇在文献发掘上的可喜收获。如资深的海派文学研究专家吴福辉先生就曾感叹，以他对海派文献的熟悉程度来读张勇的论文，其中仍有大量文献和诸多现象乃是他闻所未闻的新发现。二是张勇颇富新意和思考深度的辩证分析。这突出表现在对“摩登”与反“摩登”的性质及其矛盾运动的准确把握和辩证观照。记得资深的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先生就特别欣赏张勇独具眼光地发现了“革命摩登”，并从反摩登的角度对鲁迅和张天翼做出了别出心裁的分析。此外，评委老师们对张勇自觉打通文学—文化批评与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

方法也颇为赞赏，认为他努力于综合观照和辩证分析的研究理路，实有助于纠正孤立的纯文学批评和单纯的文化研究之不足。

作为陪伴着张勇走过三年多读博历程的老师，我对他的如期完成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自然非常欣慰。倘容我撇开师生的关系，纯以一个学术同行的立场来评论，则张勇的这本论文作为海派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阶段之标志，是可以断言的。从第二章“摩登”考辨，第三章“摩登主义”：日常生活的美学，到第五章“摩登主义”与文化消费，第六章“摩登主义”文学中的现代体验及想象，作者发掘出了大量的摩登文学以至生活现象，并深究“摩登”背后到底存在着何种力量、它们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关系、进行着怎样的博弈……从而不仅使海派文学和文化之“摩登主义”特性第一次获得了确凿无疑的证实，而且对其复杂性给予了深入透彻的揭示。这显然超越了学界已有的认识水平，而显著地推进了海派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读者只要翻看一下这些章节，就不难体会其内容的丰富和分析的深入，而无须我来一一介绍了。作为同行，我自己特别受启发的乃是张勇的一个洞见：不同取向的现代文学，哪怕是相互对抗的文学流派，仍然会共享一些重要的现代文学价值观念，而真正重要的分歧则恰在于那相似之下的不同。比如，张勇就指出，“真实”其实并不是主张写实主义的左翼文学所独尊的观念，它同时也是“海派文学最常调用的资源和创作的合法性基础”。我此前对革命的左翼和摩登的海派一直是只见其异而未见其同，所以初闻张勇此论，我当真吃了一惊，可仔细一想，事实确实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勇在洞见到这个共同点之后，更进一步地仔细辩证分析了其间的似而不同，并推而广之，以为似而不同的“真实”观，“的确构成了30年代文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许多问题背后都隐藏着关于真实性的认知，双方的分歧也常常能在对‘真实’的不同理解中找到答案”，同时他还强调对“真实”的分解也不到认识为止，而最终必然落实为人性伦理、社会关怀和文化实践上的分道扬镳。同样的，在分析摩登与现代之间的暧昧关系时，张勇既敏锐地指出“摩登的合法性基础——一元的线性历史进化观，某种程度上正植根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中”，而又强调“从相似的一元论及艺术线性发展观立场出发，新感觉派作家和左翼作家得出的结论竟颇为不同”。这些都是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的洞见。我得承认，张勇的洞见有力地纠正我这个做老师的一些简单化评判。“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于韩子此言欣有

同感，并且觉得，张勇对问题的这样一些看法和他看问题的这样一种思想方法，特别值得向学界同行推荐。

当然，一个年轻学者首次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自不免理有未周、尚待补充之处。比如，张勇在结尾一章断言，“1937年，曾经热闹一时的‘摩登主义’文学走向了衰落”。这从一个段落来说，诚然是事实，若从更大的视野来看，也就不尽然了。徐訏、无名氏的“摩登传奇”在抗战大后方的流行，张爱玲的“反传奇的传奇”在沦陷了的上海之走红，即使不能说是“摩登主义”文学之中兴，也足证其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和华丽转身的灵活性。同时，张勇又以施蛰存在抗战期间四处播迁因而搁笔不为例，来说明“‘摩登主义’文学对1927-1937这十年间的上海的深刻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确是事实，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摩登的上海又依赖着什么？对此，张勇其实是有所见的，他的具体论述已触及了老上海作为一个半殖民地都市对西洋的深刻依赖关系，对生活于其中的海派文人盲目崇拜西方时尚、竞相攀附摩登的心态，张勇也很清楚。或许是出于谨慎吧，张勇虽然触及了事实，却对摩登主义之“现代性”的半殖民地根源未敢一语道破。再如，张勇已敏锐地注意到海派文人的摩登性幻想书写中，其实浸淫着传统士人对“摩登伽女”的迷与惧，惜乎未能推而广之。其实，摩登的海派文学与文化也有其本土的源头——纵情声色、风流自赏的江南才子文艺传统。

诸如此类的缺憾还有一些，其原因除了年轻作者的经验不足和文献有缺外，还因为时间的限制。张勇是带职出来读博的，给定的三年时间实在太短，所以后来又延长了半年，但仍然不足，而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他还得兼顾工作和家事。为此他付出了怎样的辛苦、承担了多大的压力，我是比较清楚的。记得就在张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最紧张的时候，他的妻子正独自在遥远的西安忍受着妊娠反应之苦，他自然既感担忧而又苦感分身乏术。这让我很不忍心，以致我不得不把他“赶”回去西安一趟。所以论文的一些题中应有之义，虽然原在他的写作计划之中，后来却不得不割弃或暂缺，而多少有点匆忙地收束了。待到答辩通过后，张勇真是归心似箭。在生活和工作上，张勇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由于觉得几年的读博亏欠了妻子、父母以至于原单位不少，所以返回西安的近两年来，张勇把大部分心力都花在了报答积欠的亲情和补偿拖欠的工作上了，论文的修订出版不免迟滞了一点。对此，我不仅能够理解而且甚为欣赏。事实上，几乎

每个研究生毕业离校的时候，我都要对他们说生活第一、学术第二，所以听张勇来电话说他回去一直忙于工作、忙于安家和搬家等，尤其是看到他传来孩子健康可爱的照片，我委实是高兴而且放心。因为这就是生活呀，人总得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一个学者，人生首要的事情也未必就是论著的出版和学术的名利，何须匆忙慌张呢。

自然，张勇并没有为了生活而忘掉学术。最近，他终于完成了论文的修订、可以交付出版了。这虽说是晚了一点，但我重读一遍仍觉新鲜，其学术原创性迄今还是未可替代的；而张勇在修订中显然也融入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新思考，那或者正预示着他今后致力的方向吧。张勇还年轻，正所谓来日方长，其为人又耐得寂寞、为学亦肯从容从事，然则假以时日，取得超越既往的成就，是可以预期的。

阅读既竟，随手略书回忆和感想如上，权算是序吧。

解志熙

2009年10月16日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海派文学与摩登	1
第二节 作为文化实践的摩登与反摩登	7
第二章 “摩登”考辨	16
第一节 从“Modern”的音译词到“时髦”	16
第二节 词性色彩：从中性到贬义	21
第三节 “摩登”与“现代”的纠缠	25
第三章 “摩登主义”：日常生活的美学	28
第一节 时尚、商品美学与日常生活	29
一 时尚生产体系：以时尚杂志为中心	29
二 作为商品的“新”与“摩登”	36
第二节 时尚杂志与海派文学的生产	43
一 时尚与作家的互动	43
二 “集纳主义”与海派文学生产	52
第三节 现代主义抑或“摩登主义”？ ——新感觉派作家的文学实践	60
一 追逐“新兴”与“尖端”	61
二 “摩登主义”	66
第四章 “革命文学”与“革命”摩登	74
第一节 何为“革命文学”？	75
一 “同情”？“热情”？“情绪”？	75

二	“荣冠”？“意识”？“实践”？	79
第二节	鲁迅“革命文学论”的形成及其独特性	87
一	从北京到广州：“穿湿布衫”	89
二	“革命文学”论战：“打破这包围的圈子”	92
三	文学：作为“永远革命”的场域	95
第三节	“革命”摩登	100
一	“革命”叫卖	102
二	“为文学而革命”	108
第五章	“摩登主义”与文化消费	119
第一节	20 世纪 30 年代的杂志生态	120
一	杂志重要性的凸显与文人归趋	121
二	杂志的“商业竞卖”与消费主义文学的兴起	125
第二节	名人效应、“文人无行”与新黑幕小说	132
一	所谓“提拔无名作家”	132
二	“自传年”：自传类作品的兴起	135
三	“文人无行”与新黑幕小说	139
第三节	“摩登主义”与异国情调	144
一	都市作家的洋派生活方式	144
二	作为价值观念的异域情调	148
三	异域情调的政治	154
第六章	“摩登主义”文学中的现代体验及想象	159
第一节	本埠新闻与都市想象	160
一	看不见的城市	161
二	情色化的城市	167
第二节	“疾病”的意义——现代体验及其叙述	171
一	作为叙事结构的“疾病”	172
二	作为都市生活不适应症的“疾病”	178
第三节	重新掌控“她者”——女性嫌恶征	182
一	由“摩登女郎”引起的焦虑	182
二	重新掌控“她者”	185

第七章 摩登与反摩登·····	192
第一节 “真实”之辩 ·····	193
第二节 左翼文学的反摩登——以张天翼为例·····	201
第三节 国货运动、新生活运动中的“摩登破坏团”事件 ·····	208
一 国货运动与摩登·····	209
二 新生活运动与摩登·····	212
第四节 尾声：“全盘西化”、“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与现代化·····	216
一 “全盘西化”与“世界化” ·····	217
二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虚妄 ·····	220
三 一个未完的问题：如何现代化？·····	224
第八章 结论·····	228
参考文献·····	238
后记·····	248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海派文学与摩登

海派文学与都市物质文化、消费文化的关系，几乎是海派文学研究中无法避开的问题。近些年这一领域内产生了不少重要和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吴福辉先生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1995）、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2000）、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上海 1930 - 1945》（2001）等。这些著作大都同时借鉴了上海社会、历史、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广阔的视角分析了海派文学产生的都市文化语境，尤其是它与老上海“摩登”物质文化、消费文化之间的关联，在海派文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上海摩登》中，李欧梵不满于“左翼作家和后来的共产党学者”所强化的上海的“流行的负面形象”，“重绘”了上海的都市文化地图，20 世纪 20 - 40 年代上海的建筑（尤其是休闲、娱乐和消费场所，如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跑马场等）、印刷文化、电影等被同时形诸笔端。如果说《东方杂志》及其“文库”、商务版的教科书还依然带有精英和启蒙色彩的话，那么作者对《良友》画报（包括图片、文字及广告）、月份牌等的分析，则给予了以往这些不大受人重视，也难登文学研究大雅之堂的材料以重要的一席之地，^①很有启发性。

《上海摩登》确立了海派文学研究的一种流行范式，宏观上看，它无疑借鉴了时下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也带有当今学术界弥漫的“后学”思潮的烙印，由于对宏大叙述的

^①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 - 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怀疑和规避，学科整合本可激发出的有意义的问题、焕发出的巨大能量，几乎被微观化的视野抵消殆尽了。对以往意识形态论述的不满，也并未导向一种更全面、科学的考察，而是矫枉过正、刻意忽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其实，微观研究不只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才与宏观发生关系，即所谓的“显微见著”，而是必然关联着宏观，毋宁说它是宏观的一个缩影，宏观总是微观研究中最常触碰到的问题，也决定着微观研究的成败。以“摩登”而言，一旦我们追问一些更为前提性的问题，如什么是摩登？哪些事物可以称得上“摩登”？“摩登”与非摩登的边界在哪儿、是由什么力量决定的？就不得不跳出现象本身，探寻现象背后的制约力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力量包括一系列的政治、资本（包括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文化力量，摩登现象是它们共同博弈的结果，而这些制约力量之间是如何争夺、如何形成合力的过程被掩盖了。显然，“摩登”不是自明的，而是历史的。进一步说，如果要探讨上海的“摩登”，就不能只限于描述摩登的物质、文化现象，而应该追究“摩登”背后的各种力量之间是如何发生关系的。因而，考察海派文学与摩登的关系，也最终需要理解海派文学与“摩登”背后这些力量之间的关系。正如刘建辉指出的，目前研究中“虽然存在着诸多的有关‘摩登’的事实叙述，但是这些事实是如何被‘生产’出来又是如何被‘消费’的，在它们背后，近代资本主义的‘欲望’力学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关于摩登的各种话语、各种表象之间有何内在的联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说还没有被真正解释清楚”^①。

然而，这些话语、力量间的关系又必须借助于一些个案才能得以呈现，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作用的方式也会因情形不同而异。本书考察的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摩登主义”。所谓“摩登主义”借用自历史概念，20世纪30年代浦江清、朱云影都使用过这个概念，后者还对其有十分详细的分析（详见第三章）。按照“摩登”一词在30年代的主要意涵，“摩登主义”简而言之就是指把最新的社会思潮、外来文化当作时髦加以模仿和趋附。在当时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了这种文学现象：陶晶孙在《大众文艺的“史的考察”》一文中指出了知识青年思想

^① 刘建辉：《挂在墙上的摩登——展现欲望都市的又一表象》，载孙康宜、孟华编《比较视野中的传统与现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0页。

上的摩登化倾向：“知识青年是从古以来之读书大众，他们也爱娼妇之敷衍，所以三角四角恋爱之通俗小说可卖，春画美女画报有销路，他们喜时髦，所以欲谈革命，但是怕死，所以无毅力，因此似是而非的革命也可以宣传，手淫小说销得如飞，文学商人借此可赚钱、政客可以得群众。这种摩登化倾向虽是很可恶，但是在这大众内亦可找得革命的青年，所以工作不可完全因为困难而停止。”^① 有人则谈到了“文坛上的摩登风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才子佳人’又飘飘然起来了。……才子的才气，原来使人受不了，因为他大概不曾知道世界上有旁人。‘不才子’的才气呢，更要使人逃跑了，东施也捧心，是最好的譬喻；这又加上了西洋大都市的颓风，殖民地的野蛮气氛，然后成就了‘摩登’风度。”^② 还有人注意到白话文蜕变为“洋八股”和“摩登文章”的可能性：自“白话文运动”以降，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但是不久白话文“却又另外戴上一副形式比较摩登的枷锁”，“由旧八股变成洋八股”，“变成了一种‘摩登文章’”^③。无论是思想上的摩登化倾向，还是弥漫着殖民地都市颓废气息的新“才子佳人”小说，以及语言上的“洋八股”，都是“摩登主义”的典型表现。此外，它也体现在作家的文学活动中，例如，以曾朴、曾虚白、张若谷等组成的文学圈子和以章衣萍、华林、徐仲年等组成的“文艺茶话”对法国文学沙龙亦步亦趋的模仿。并不令人惊奇的是，“摩登主义”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也是摩登、洋派生活的狂热信奉者（详见第五章）。这样，“摩登主义”就不仅限于文学范畴，而是扩展到了整个文化层面，代表了某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因此，对“摩登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放置到此类文化现象中考察。

“摩登主义”文化现象中最普遍的是时尚文化，时尚化是此类现象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时尚自然不限于一时一地，“摩登主义”文化也非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专利。例如30年代上海掀起过的女性男装风尚和对“裸体运动”的讨论，在其他城市同样产生过回响，《玲珑》上就曾刊登过汉口三个摩登女郎学流氓的男装照片，哈尔滨甚至还产生了名为“亚当与夏娃”的裸体运动组织，在此事上表现出比上海更为激进的姿态。30年代轰动一时的《啼笑因缘》塑造了“摩登女郎”何丽娜的形象，它

① 陶晶孙：《大众文艺的“史的考察”》，《读书月刊》1932年第3卷第5期。

② 古董：《论文坛上的摩登风气》，《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3日。

③ 灵犀：《关于文话的论战》，《社会月报》1934年第1卷第2期。

虽然在上海的《新闻报》上连载，却是以北平作为故事背景，描写了当时北平摩登男女的生活场景；叶鼎洛的讽刺小说《老摩登的艺术》发表于西安的《文艺月刊》上，刻画了活跃在当地社会的一位“老摩登”^①。然而，30年代的上海无疑开风气之先，是中国“摩登主义”文化的中心。自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甚至出现了畸形繁荣景象。这十年中的上海政治、社会、文化都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综观上海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研究著作，也不乏以这一时段作为相对独立的对象来论述的，如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安克强的《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所以，笔者选取1927—1937年的上海文化和文学作为研究对象。

“海派文学”至今仍是个颇有争议的概念，吴福辉先生在《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曾从其生成的四个方面——“外来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明”、“新文学”对其进行了限定，并把“前洋场文学”排除在“海派文学”之外，从而使得这个概念本身具备了现代性的特质^②。笔者所分析的对象绝大多数属于“海派文学”，考虑到这个概念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内涵，为了称呼上的方便，笔者有时也使用“海派”、“海派文学”、“海派都市文学”等概念。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摩登主义”文化和文学现象绝非只限于海派文化、文学和这一时段，只不过在其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罢了。反之，并非所有的海派文化、文学都是“摩登主义”的，即便是具备“摩登主义”特质的文化、文学作品，也并不意味着“摩登主义”可以涵盖其所有的方面。例如，上文提到的《啼笑因缘》，其中关于关氏父女参加东北义勇军抗击日本兵、北平社会摩登生活场景等情节具有“摩登主义”的成色，但根本上它仍然是一部鸳蝴派的作品。总而言之，“摩登主义”是指某类文化、文学行为和现象，并不适宜作为一个文学派别的名称。这也是我在“摩登主义”之外继续使用“海派”、“海派文学”等概念的重要原因。

海派都市文学中充满了对摩登消费娱乐场所及摩登男女关系的叙述，同时这些几乎也是作家自身生活的写照。然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后者只是

① 叶鼎洛：《老摩登的艺术》，《文艺月刊》（西安）1943年第2卷第1期。

②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前者的题材。如果说作家只是如实地记录了自己的生活,那么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海派都市作家为什么会对摩登生活如此痴迷?布尔迪厄关于“审美消费与日常消费的同源性”的判断可以帮助我们更深一层地理解这个问题,他认为:“关于鉴赏力和文化消费的科学始于一种违反,这种违反根本不关乎审美观:它必须取消使正统文化成为孤立领域的神圣疆界,以便找到明白易解的各种联系来统一那表面上不可比较的‘选择’,比如对音乐与食物、绘画与娱乐、文学与发型的偏好。”^①也就是说,必须在作家的“日常消费”与“审美消费”之间建立某种关联,才能发现海派作家作品中的某些秘密,否则无法解释为何偏偏摩登事物成为审美对象。换言之,摩登事物在海派作家那里被赋予并承载了特定的价值观念。

不管是作家的生活还是创作,“摩登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趋新。人们在解释它时时常求援于人性、年龄、文化之类的因素,而掩盖了真正的问题。这种解释由来已久,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人断言:“用时新来解释摩登,我想或者是半斤对八两恰恰相称吧!因为:人性没有不好奇的,没有不喜欢新的,更没有不觉得希望之成功或偶然之适遇为可贵的。……时代的风尚和趋就,当为时代变化特有的象征,也就是人们好奇喜新以及某种成功某种适遇的表现。”^②当代研究者中也有人将上海人“乐于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的原因归诸其“向来有灵活、尚新的特点”^③,同样是把这个问题自然化了。在笔者看来,上海人“灵活、尚新”是“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等外力作用的结果,而非原因。此外,“新”本身也是有待分析的。柯林·坎贝尔曾区分了三种不同意义上的“新”:“首先是作为新鲜的或新近创造的新(fresh or newly created);其次是作为改良的或革新的新(improved or innovative);最后是作为不熟悉的或新奇的新(unfamiliar or novel)。”^④显然,这三种“新”不可混为一谈,尤其是当现代性话语渐渐将“新的”塑造并等同于“好的”的情形下,对“新”的拆分

①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导言》,载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② 特罕:《摩登与矛盾》,《新社会杂志》1931年第1卷第1期。

③ 叶晓青:《上海洋场文人的格调》,载汪晖、陈国良编《上海:城市、社会与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④ [英]柯林·坎贝尔:《求新的渴望——其在诸种时尚理论和现代消费主义当中表现出的特性和社会定位》,载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

就更为重要了。“摩登主义”中所趋的“新”多见于第一、第三两种，它源自肤浅的模仿或消费，是缺乏创造性的。

理解“摩登主义”特质的一个便捷途径是广告。本书中也涉及了当时书刊中的一些广告，把它们当作广义上的社会、文化文本，即是因此而来。广告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商品的销售，尽管它们在广告词中使用最时髦的字眼，比如“革命”、“救国”、“新生活运动”等，而且喜欢调用社会上最新、最引人关注的事件，但基本上对这些思潮的具体实践、社会事件的具体意义毫无兴趣。商业利润是“摩登主义”的主要追求目标之一，赶时髦不过是以此为幌子招徕顾客。它既不代表赶时髦者真正的思想，也是与具体实践脱离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出版业。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中将 1925 - 1927 三年称为“新书业的黄金时代”，借北伐战争的契机，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和共产主义 ABC 等书籍大为风行，一些出版商靠这些书籍赚得杯满钵满。出版商关注的是这些书籍的高额回报，对它们所宣扬的“主义”、社会理想及实践要求置若罔闻，但是他们又必做出是这些“主义”的信徒的样子来。在这一过程中，“革命”、“救国”等社会思潮实际上是“被消费”了。波德里亚认为，当一个文化实体，“其内容并不是为了满足自主实践的需要，而是满足一种社会流动性的修辞、满足针对另一种文化外目标或者干脆就只针对社会编码要素这种目标的需求”时，这种文化实体就“被消费”了^①。

当然，以广告类比“摩登主义”的最大缺陷是，后者不全是为了利益，有时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心理满足，或仅被装饰为某种姿态。瞿秋白曾批判“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高呼“文化运动的消沉”、“知识阶级的使命”、“继续五四的精神”之类的口号，“因为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民族主义，到这时期已经差不多破产得干干净净；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意识上的武器——所谓诸葛亮主义的买办性，已经暴露得没有丝毫余地。所以他们要想出来玩一套另外的把戏，企图用一些时髦的摩登化的空谈，欺骗广大的民众”。同样是这些人，他们也会“姘几个披头散发的姘头——所谓摩登女郎。华贵的富丽的公馆里，居然也会陈设些未来派的直线主义的新式木器”。“这正是殖民地的中世纪的茅坑，和帝国

^① [法]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1 页。